

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从佛兰德斯地区谈起

Adaptive Reuse of Heritage: Observations from Flanders

[比]比耶·普莱沃茨 文 | Written by Bie Plevoets

李玲娇 译 | Translated by LI Lingjiao

刘仁皓 苏清商 校 | Proofread by LIU Renhao SU Qingshang

摘要：适应性再利用，即改造既存建筑以使其能够延续过去的功能或适应新的功能，已成为一门涉及建筑学和保护学的交叉学科。它是当今欧洲建筑界最重要的实践方法之一，向来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欧洲遗产保护界，也逐渐将其关注点从标准严格的保护修缮转向再利用和（适度的）适应性改造。本文从历史角度对适应性再利用这一现象进行定位并介绍当代欧洲的相关政策；通过案例分析，详细描述了佛兰德斯地区目前的相关政策和实践活动；展望了适应性再利用这门学科的未来，以及其他文化现象对它的影响。

关键词：适应性再利用、佛兰德斯地区、遗产政策、宗教遗产、废墟、城市再生

Abstract: Adaptive reuse, which is the process of altering an existing building for a new or continued use, has become a crossing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conservation. Not only is it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architectural practice in Europe today, but the the field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which traditionally occupies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Europe, is also shifting its focus from strict restoration towards reuse and, modest, adaptation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role of adaptive reuse by positioning the phenomen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contemporary European policy. The current policy and practice in Flanders are elaborated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the future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influence of other cultural perspectives are expounded here.

Keywords: Adaptive reuse, Flanders, Heritage policy, Religious heritage, Ruins, Urban regeneration

一、适应性再利用的历史

适应性再利用，即改造既存建筑以使其能够延续过去功能或适应新的功能，是当今欧洲建筑界最重要的实践方法之一。它不仅适用于文物建筑，也适用于建筑价值或历史价值一般的普通建筑。正因如此，如今许多建筑事务所不再强调参与过的新建项目，转而以既存建筑的改造更新项目来重新定位自己。而向来处于领先地位的欧洲遗产保护界，也逐渐将其关注点从标准严格的保护修缮转向再利用和（适度的）适应性改造。可以说，适应性再利用如今已成为一门涉及建筑学和保护学的交叉学科。

对既存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自古有之。在早

期，建筑改造通常不会引来质疑或非议。因为当时的建筑材料昂贵且难以生产运输，改造建筑往往出于实用或经济的目的。实际上，许多历史上著名的建筑正是由于不断的使用和改造才得以保存，例如克罗地亚古城斯普利特（Split in Croatia，图1）。斯普利特这座城市建立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宫殿遗址的基础之上。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下令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海岸建造一座宫殿，兼作退位后的行宫和防御工事。然而一直到戴克里先去世，这座宫殿都未被使用。大约300年后，斯普利特的邻镇萨洛纳（Salona）被攻占摧毁，当地的居民沦为难民，纷纷逃到戴克里先宫殿的遗址避难。随后，这些难民开始逐渐根据自己的需求改造遗址，将原本的

作者：

[比]比耶·普莱沃茨，哈塞尔特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研究员，适应性再利用硕士培训负责人。

译者：

李玲娇，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校者：

刘仁皓，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馆员；苏清商，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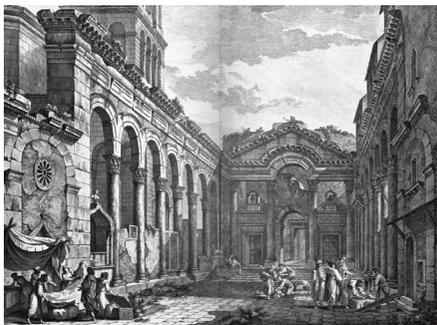


图1: 戴克里先皇帝在斯普利特的宫殿遗址。罗伯特·亚当姆于1764年绘制

行宫改为住宅、教堂、公共建筑、广场和街道。最终，改造活动超越了宫殿的原有范围，一座建立在城堡遗址上的城市诞生了。^[1]

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出台保护历史建筑的政策和法律，如建立国家性“遗产名录”等。当时处理历史建筑的常规做法是进行单纯的保护修复。富有创造性的改造往往被视为异端。与此同时，建筑领域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工业化推动社会的快速城市化，法国的勒·柯布西耶和德国的包豪斯成员等现代主义者发展出了全新的建筑思想，和突破传统、追求适应现代材料和现代技术的新建筑形式。他们对于建筑和城市的设想中存在一种“白板理念”，即用全新的建筑、全新的地区，甚至整座新建的城市来替代既存的旧建筑。

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两个领域的创新都暴露出其局限性。在遗产领域，过去，遗产保护的范畴仅限于辉煌的历史遗迹，如古老的废墟、中世纪教堂、修道院、城堡以及礼仪性公共建筑。但是到了20世纪，遗产的概念范围扩大了：与普通人民生活和工作相关的建筑、工业遗址、现代建筑以及城市、乡村的历史景观成为当地历史和形象的代表，大量建筑随之被列入值得后代保护的遗产名单中。早期那种为保护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像保存艺术品一样不再赋予其社会或经济功能的做法已不再可行。在建筑领域，现代主义对建筑和城市理解的弊端也浮出水面：现代主义的集体住宅设计被证实不符合人类尺度，亦不能满足居民更为个性

化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城市看起来也缺乏地方认同感。建筑理论和实践界都开始质疑现代主义的教条，并转而追寻一种能够与当地的景观、建筑肌理、现实社会文化相结合的，更“本土化”的建筑。^[2]

上述问题使建筑师和保护从业者将目光投向了既存建筑在新功能下的再利用。诸如《威尼斯宪章》和《巴拉宪章》等国际保护宪章，均明确将遗产的再利用列为保护遗产的重要途径之一。一些更晚制定的宪章则进一步强调了在历史建筑、遗址和城镇保护修复工作中，平衡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利用价值的重要性。1960年代，一些建筑事务所捕捉到了这股遗产改造的风潮并投身其中。这其中的先驱有意大利的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 1906—1978）和吉安卡罗·德卡罗（Giancarlo De Carlo, 1919—2005）、挪威的斯维勒·费恩（Sverre Fehn, 1924—2009），以及出生并成长于意大利但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在巴西度过的丽娜·柏·巴蒂（Lina Bo Bardi, 1919—2005）。

其中，斯卡帕对维罗纳的卡斯特维奇博物馆的改造（Castelvecchio Museum, 图2、图3），是适应性再利用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项目延续了20多年，整个改造工作并不局限于修缮或简单的功能升级，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栋建筑的空间组织和布局，以及建筑本身的外观和内涵。斯卡帕去除了建筑上早期修复的痕迹以及拿破仑侵占时期的加建部分，“重写”了整座建筑，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信息同时得到展现。此外，斯卡帕还使用了钢铁、混凝土等现代材料，在此次新增的建筑表皮上留下了当代的印记。可以说，

斯卡帕的改造空前成功，他坚定的理念、巧妙的空间组织和精致的细节已经成为这座建筑的历史的一部分，影响着该遗产的建筑和历史价值。

二、适应性再利用：涉及建筑学和保护学的交叉学科

时至今日，欧洲建筑市场一半以上的项目都是改造再利用项目。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建筑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拉卡顿与瓦塞尔建筑事务所（Lacaton & Vassal）、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卡鲁索·圣约翰建筑事务所（Caruso St. John）等明星事务所都越来越关注建筑的适应性改造。这些事务所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如何平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秘而不宣的）知识体系。鉴于当代的建筑学知识体系高度互联，这套体系不仅可以应用于改造历史建筑，同时也适用于新建建筑。甚至在2010年，雷姆·库哈斯就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作品《Cronocaos》中提出“建筑保护正在超越我们”。库哈斯在其发言中指出，当今建筑界已经不再需要特立独行的“标志性建筑”——使用创新性的材料、技术，或展示全新形式的新建筑已不再受追捧。而“保护性修缮”和对既存建筑的设计才是建筑界现在以及未来的主题。

在此背景下，建筑学院们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教学计划，尽量让未来的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和规划师做好应对既存建筑可持续性改造的挑战。对于这一现象，马查多（Machado）在其开创性的文章《重写旧建筑》（*Old Buildings as Palimpsest*）中进行了说明。在这篇文章中，马查多用“重



图2: 卡洛·斯卡帕改造后的卡斯特维奇博物馆庭院(1964年)



图3: 1964年的卡斯特维奇博物馆室内

塑”(remodelling)来形容建筑的适应性改造,并用写作中的创作和重写来比喻新建和改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重塑设计课程的初始阶段就应向学生强调重塑的意义和价值,并强调重塑过程中理解过去风格和技术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一些学校开设了有关适应性再利用的硕士课程项目,例如罗德岛设计学院(美国)的“干预和适应性再利用”项目、曼彻斯特建筑学院(英国)的“建筑连续性”项目和哈塞尔大学(比利时)的“适应性再利用:探索既存建筑潜力和诗意”项目。这些项目的课程往往涵盖解读既存空间品质和特征、发现与既存空间相关联的概念、制定干预策略等内容。

三、当代建筑与适应性再利用:佛兰德斯地区的实践与政策

本节主要介绍佛兰德斯地区^[3]适应性再利用方面的实践和政策,包括佛兰德斯地区的实践案例,佛兰德斯地区的事务所在国际上的作品,以及以讲座、展览、出版物或活动形式体现的“建筑文化”思想。佛兰德斯地区的这些项目代表了欧洲适应性再利用作品的最高水平。在过去的20年里,它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和赞赏。这些成果不仅归功于某些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设计师或事务所,一些机构和组织作出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例如成立于1999年的佛兰德斯建筑大师小组(简称BWMSTR)。BWMSTR成立的初衷是提升佛兰德斯地区建筑和城市的质量。它的运营模式仿照了荷兰沿袭至19世纪末的建筑大师制度:当公共或私人项目需要遴选建筑事务所或团队进行重要的或复杂的设计时,BWMSTR就会启动“公开征集”程序进行筛选。在该程序中,邀请各个设计团队参与设计竞赛,经过选拔后,脱颖而出的设计团队将全身心投入设计方案,成果交由评审团进行匿名评估。如今,BWMSTR团队的工作涉及许多不同领域,包括针对具体空间的问题、机遇的试点项目、展览、针对年轻专业人员的竞

赛等。与BWMSTR几乎同时建立的还有成立于2001年的佛兰德斯建筑协会(简称VAI)。VAI成立的初衷旨在传播佛兰德斯地区和布鲁塞尔地区的建筑成果,并通过组织出版物、展览和讲座激发人们对于建筑的讨论。此外,VAI还负责整理建筑档案以及策划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除了关注新建筑,上述两个机构同样关注改造既存建筑,以及当代语境下如何激活改造建筑。例如BWMSTR手下的一些“公开征集”和“试点”项目,就涉及历史建筑或历史景观。若这些项目涉及的遗产处于法律保护之下,BWMSTR就会与诸如不可移动遗产管理局这种作为申请指导委员会代表或评审团队的机构合作。而VAI则主持过几个在既存建筑和遗址更新与再利用方面极为重要的展览和活动。

除了建筑行业,各类遗产和保护机构也愈发关注建筑遗产和遗址的再利用问题。1990年代以来,有关遗产的政策就不断强调“整体性保护”的重要性。所谓整体性保护,就是完整保存遗产及其所处社会环境。在整体性保存中,保护工作不仅要考虑对文化价值的保护,还要考虑对使用价值的保护。到了2015年,随着新法案的通过,部分针对文物建筑适应性再利用的可行性研究开始得到补贴。尽管如此,在实践中,仍有许多项目因无法平衡建筑、社会、经济、遗产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关系,而引得参与方与相关利益者纷争不断。

下面的章节将重点介绍佛兰德斯地区适应性再利用的四个经典案例。这四个案例均完成于BWMSTR“公开征集”制度出现后的十年中,且均建设于建筑遗产之上,因此有一定相似性。但它们处理既存建筑的策略却各不相同:

1. 在全景监狱改造为大学校园的哈赛尔特大学(Hasselt University)市内校区改造项目中,noA architecten建筑事务所保留了原全景监狱的基本形式,但对建筑的流线、可达性和自然光照明都做了较大改动。

2. 在C-Mine活动中心改造项目中,51N4E建筑事务所将原采矿场能源大楼改造成活动空间,恢复了原建筑的外立面以

及部分的室内设计和机械,并加建两个建筑体以承担部分新功能。

3. 在PC Caritas精神病学中心改造项目中,由于该建筑的价值直到拆除工作开始后才被认识到,因此de vlyder vinck taillieu建筑事务所基本是在一座化为废墟的建筑体上改建了一座花园凉亭。

4. 在Het Predikheren公共图书馆改造项目中,Korteknie Stuhlmacher Architecten建筑事务所把Predikheren修道院改造成公共图书馆,恢复结构和外观,强化了原修道院的室内设计。且为了保护原有的建筑室内部分,所有为实现新功能而进行的干预都是可逆的。

四、从监狱到法学院:哈赛尔特大学市内校区改造,noA architecten建筑事务所(2008—2012年)

在建筑改造领域,有些类型的建筑由于外观与功能联系过于紧密,因而几乎无法在不改变原状的前提下加以利用。平面呈放射状的监狱无疑就是这样难以改造的建筑类型之一。然而在哈赛尔特,noA architecten建筑事务所就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将一座呈放射状展开的监狱改造为哈赛尔特大学的法学院,并将新功能天衣无缝地插进监狱原本的设计之中。哈赛尔特大学坐落于哈赛尔特城周边的乡镇地区,虽然一直想要在市区建立校区,但当时唯一可供其使用的地块上却是一座已废弃的、平面呈放射状的监狱。该监狱建于1859年,直到2005年才彻底停止使用。尽管该监狱一直以来并未得到细心保护,但鉴于其已被列入官方遗产名录,哈赛尔特大学也不能将其拆除了事。面对监狱高高的围墙和封闭的内部空间,哈赛尔特大学始终心存担忧,毕竟他们心中的新校区应当是一个能够展现该校开放和热情态度的空间。noA architecten事务所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监狱建筑的封闭性正是它的优点:其高耸的墙壁恰好可以为学生提供提供一个安全隐蔽的学习和休息场所。

于是,noA architecten事务所的建筑

师们完整地保留了该放射状监狱的高墙和正立面，仅将正立面两边的大门替换成格栅门以露出墙后的庭院（图4）。他们还保留了监狱内部的基本结构和特征性空间：放射状平面的中心被改造为主门厅（图5），原本的牢房被用作学生们的自习室（图6）。在如五指般展开的翼楼中间的三角形庭院中，则增加了两个礼堂和一个自助餐厅。原本分散在各个翼楼中的走廊则被拓宽，并增加了通往新建礼堂和餐厅的入口。另外，在原来的放射形监狱中，由于窗户很小，日光几乎无法进入。因此建筑师在改造时，特意在新旧建筑屋顶交接的部分使用玻璃以引入阳光。建筑师还开放了部分绿化处理后的屋顶，让人们可以鸟瞰改造后的监狱。凭借着迷宫般的布局和极为宽敞的室内外庭院（图7），这座建筑现在已



图4：哈赛尔特大学法学院鸟瞰

成为学生们自习、开研讨会、举办学校活动或其他相关活动的最佳公共空间。

五、适应性再利用与城市再生：C-Mine 能源大楼，51N4E（2004—2010年）

在实践领域中，适应性再利用不仅可以保护单体建筑，也可以促进城市再生。例如对城市消极空间或废弃工业区的再利用，就可以给当地带来经济收益，同时增强地域认同感，促进社区凝聚力，并提高当地的生活质量，最终实现城区再生。C-Mine 就是这样一个工业区被改造后再生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一处位于亨克（Genk）的采矿场被建筑师巧妙地改造成了一个包含文化中心、学校、工作坊和



图5：哈赛尔特大学法学院的主门厅

商业建筑的创意中心。这个采矿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亨克还只是个小村庄，但依靠着村内的三处矿产，亨克很快开始工业化，并在空间和社会层面飞速发展。然而到了1980年代，亨克的矿区关闭，大量居民随之失业。向来以工业城市自居的亨克陷入了自我认知破灭的危机，人们亟需重新建立城市认同感，大片的废弃矿区也亟待重新使用。在此背景下，温特斯拉格（Winterslag）矿区被首先改造，形成了现在的C-Mine。改造后的C-Mine保留了矿区原本的竖井塔、行政楼、能源大楼和一些较小的马厩和棚屋。通过改造，过去割裂的土地得以重新生长，废弃的矿坑得以转化为居民的休憩之所（图8）。

在C-Mine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无疑是能源大楼（图9）。这座曾经控制着矿井地下隧道氧气的建筑，如今已被51N4E事务所改造成了C-Mine的文化中心，是整片区域的核心。在能源大厦的正立面，一个巨大的黑色金属入口分割了建筑的室内空间与室外广场。穿过该入口，游客将进入新文化中心的中央大厅。这里曾经被用作能源大楼的地下室。而如今，51N4E事务所保留了这里昏暗的气氛，并通过陈列过去采矿场的机器以营造迷宫般的空间体验。沿着能源大楼原本的螺旋楼梯或新建的混凝土楼梯向上（图10），就可以到达开敞而充满阳光的上层空间。在这层中，51N4E事务所在中央的涡轮机房两侧各添加了一个体块作为礼堂。下层的屋顶则被用作了连接原建筑与新礼堂之间的平台（图11）。而在室内装修方面，51N4E事务所保留了该大楼原始的丰富内装。用当地彩陶制成的墙裙、铸铁的楼梯、用红白色瓷砖装饰的地板，甚至室内因岁月流逝而留下的污染、锈迹，都在C-Mine中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奠定了大楼的装饰风格。



图6：哈赛尔特大学法学院的自习室



图7：哈赛尔特大学法学院的庭院



图8：从远处看向能源大楼



图9：能源大楼室外

六、废墟再利用：PC Caritas 精神病学中心，de Vylder Vinck Taillieu（2016年）

从古至今，废墟总是能激起艺术家们无限的兴趣和灵感。这种被自然侵蚀过

的、破碎的建筑残存在其他领域或许极有吸引力，但在适应性再利用领域却并不是个轻松的话题。毕竟，废墟与再利用听起来就相互对立。事实上，废墟的破碎、无用、室内外无明确边界等构造和特性，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其难以被再次利用的属性。然而在比利时梅勒的 PC Caritas^[4] 精神病学中心改造项目中，de Vylder Vinck Taillieu 建筑事务所却利用了废墟室内外模糊的特点，最终完成了出色的改造。PC Caritas 项目始于一所精神病学中心。由于不再承担作为护理机构的功能，该中心一座哥特复兴风格的大楼被责令拆除。然而考虑到这座楼作为该机构历史与标志的价值，拆除工作很快被搁置。在此背景下，de Vylder Vinck Taillieu 建筑事务所介入了项目，并选择继续对该建筑进行有选择的、碎片化的拆除，只留下一副没有屋顶、没有地板、没有石膏板的建筑骨架。建筑不同楼层之间的楼板被部分拆

除，以营造通高空间。部分窗户被完全移除完，部分只保留了框架，还有极少数同时保留了原始的框架及玻璃（图 12、图 13）。整个大楼被改造成了公园的一部分，其内部空间被完全暴露在自然之中。为此，de Vylder Vinck Taillieu 事务所在改造时特意使用了室外景观设计中常用的材料和元素，如碎石铺地、绿叶植物和树木。建筑室内和露台上还有一些玻璃房子，为需要的人遮风挡雨（图 14、图 15）。相较于这里其他功能性的建筑，PC Caritas 凉亭般的设计显示出一种非正式感，让人们更愿意来此休憩或体会不同的邂逅。

七、宗教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Het Predikheren 公共图书馆，Korteknie Stuhlmacher Architecten（2011—2019 年）

在当今的西欧，宗教建筑正处于“危

机”之中。受到国家世俗化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牧师、修士和做礼拜的人急剧减少。教堂和修道院有些尚可以偶尔使用，有些则被永久关闭。许多宗教建筑都因此被改作他用，出现在文化、公共项目或商业再开发项目中。

在这些项目中，一个较近期的案例是梅赫伦的 Het Predikheren 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将一座修道院改造成城市公共图书馆。该修道院原建于 17 世纪，历史上经历了几次改动。18 世纪，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修道院遭到镇压，院内的物品和房间被没收，充为军用。之后，该修道院又先后被用作学校和医院，直到 1975 年才被彻底废弃。在改造该文物建筑的过程中，Korteknie Stuhlmacher Architecten 建筑事务所没有进行过多干预，而是将新的功能整合到原本的平面布局中。在新的图书馆中，建筑师将门厅、展览空间和咖啡厅等公共性最强的空间均安排在一层，并设置了可以直达内部庭院公共露台的通道。二层和阁楼是真正的读书空间，建筑师在此设置了书架、宽敞的阅览室和更私密的个人自习室。至于该修道院的教堂空间，虽然目前还在翻修，但预计未来将用作一个露天广场，以强化这栋建筑的公共属性（图 16）。

由于已经被遗弃很久了，这座修道院从里到外都经历了严重的退化。在外观修整中，Korteknie Stuhlmacher Architecten 事务所的建筑师们清除了建筑上随岁月积累的锈迹斑痕，仅保留了红砖上早期改造的痕迹。他们还在屋顶上添加了老虎窗以有效利用阁楼（图 17）。而在室内修缮中，保留了旧有建筑上的大部分历史痕迹，如



图 10: 能源大楼室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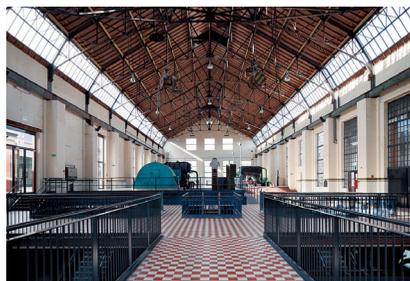


图 11: 能源大楼室内之二



图 12: PC Caritas 项目之一



图 13: PC Caritas 项目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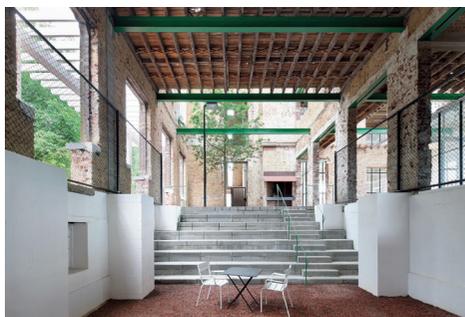


图 14: PC Caritas 项目之三



图 15: PC Caritas 项目之四



图 16: 改建中的教堂空间



图 17: 修道院室外

墙上龟裂的涂料、拱顶上脱落的灰泥和白粉。为了保护室内墙体，使之不再退化，还在修道院外墙上安装了一人高的木质护墙板。这些护墙板被做成了书架、长凳、门或隔声板的形式。这种对木石等天然材料的巧妙使用和温和的改造手法，使得该修道院的设计极为耐看，历久弥新（图 18、图 19）。



图 18: 修道院首层



图 19: 修道院二层的图书馆

八、遗产全球化观念对该学科未来和欧洲适应性再利用实践的影响

上述案例分析表明，对既存建筑的再利用能够丰富建筑实践，促进城乡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研究和利用既存建筑的品质和特点，建筑师可以创造更多、更新型的复杂建筑和空间。佛兰德斯地区当下就有几个很有前景的复杂空间改造项目，例如由 noA architecten 建筑事务所和 EM2N & Sergison Bates 建筑事务所合作的 KANAL 项目。该项目位于布鲁塞尔北部，最终目标是将在一座坐落在城市运河旁的雪铁龙工厂改造成一个包含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功能综合体。该博物馆未来将被用作蓬皮杜中心的分馆。又例如由 Bovenbouw 建筑事务所承接的哈塞特的女修道院更新项目。该项目中更新后的女修道院将被用作建筑学院。另需提及的是，在佛兰德斯地区高质量的适应性再利用实践背后，诸如 BWMSTR 和 VAI 的一类机构一直都在贡献他们的力量。

适应性再利用不仅是一种利用既存建筑的手段，它还是一种对待建成环境的方法论。比起创造新的地标建筑，适应性再利用更推崇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既存建筑进行前所未有的、创造性的翻新——从博物馆、剧院、市政厅等纪念性建筑，到医院、学校和战后社会住房等遗产价值有限的建筑和遗址，都可以成为适应性再利用的实施主体；适应性再利用还推崇更加符合语境的、根植于本土的、整体化的建筑。上述关于适应性再利用的观点由来已久，在 1970 年代马查多就指出，对既存建筑的重塑不仅是对建成环境历史信息

这种方法论还可以更广泛地应用到其他领域。受这种思想影响，如今，一些当代建筑师在面对改造和新建项目时，会使用相同的空间和概念上的处理方法。

欧洲在遗产保护和再利用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随着近年全球化的发展，来自世界各地的理念、传统和技术对欧洲本土适应性再利用的实践和建筑物既存（历史）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最早出现在 1970 年代。当时，随着《世界遗产公约》的制定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大量关于某些概念的不同解读的讨论开始涌现。这些讨论甚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遗产保护和修复理论的多元化、细致化发展。其中较为知名的案例，就是对真实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含义的讨论和随之通过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全球化对遗产和再利用领域的影响还体现在一些国际公约上——《奈良真实性文件》和《巴拉宪章》就是在亚洲、澳大利亚、北美、南美和非洲遗产保护经验基础之上编撰形成的国际性文件。此外，遗产全球化观念还带

来一个至关重要的改变，即对遗产的理解从有形向无形的转变。在《遗产的利用》(Uses of Heritage) 一书中，劳拉简·史密斯 (Laurajane Smith) 指出，“所有的遗产都是非物质的”：

“遗产是认知的象征性表现。物质化的或有形的遗产是那些代表某一地区、某种存在、某个归属或群体的‘过去事物’的具象化表现。”

她认为遗产真正的最重要的价值是非物质的存在，是蕴含在遗产之中的理念、传统和功能。若以史密斯的理解为基础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将一些能够保护非物质遗产价值的新建项目也纳入遗产保护理论。这些项目可以是对某些社群活态遗产的重新利用和阐释，可以是对城市过去的类型和形态的恢复，也可以是按照现存或掩盖在地面之下的历史痕迹进行的重建。获得 2019 年阿迦汗建筑奖的阿卡迪亚教育项目 (Arcadia Education Project) 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图 20）。该项目位于孟加拉国的南卡纳尔托 (South Kanarch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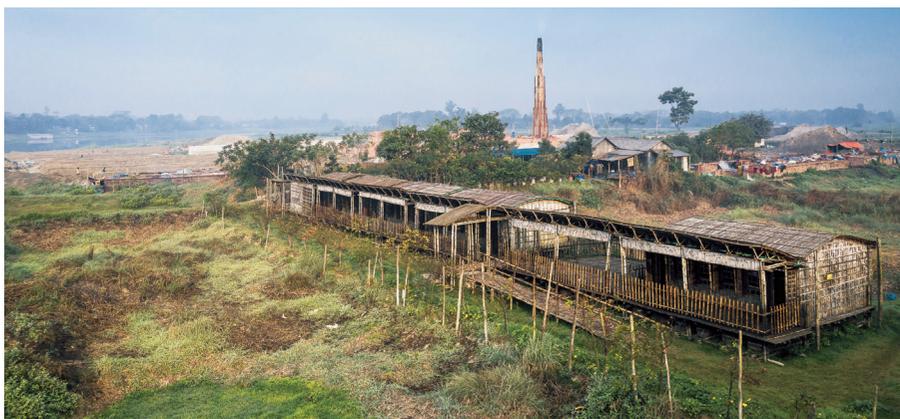


图 20: 阿卡迪亚教育项目

由 Saif Ul Haque Sthapati 建筑事务所设计完成。由于当地雨季洪水泛滥，该项目所处的地块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被洪水淹没。想要在此建设学校，可谓困难异常。面对这种情况，Saif Ul Haque Sthapati 事务所的建筑师们设计出了一种可以随着季节变化而在水陆之间转化的建筑结构。这种结构主要使用当地多种竹子制成。结构下方安置了回收来的大钢桶，并设置了和地面连接的锚点。在雨季，竹子和钢桶的组合让该结构能够在水面漂浮，而到了旱季，锚点又让该结构能够回落到原本的位置。通过连接组合上述结构单体，建筑师们最终完成了一座包括教室、办公室、厕所和蓄水池的学校建筑。鉴于该项目对当地材料和技术创新性应用，以及对一直不被看好的建筑用地的巧妙利用，评审团最终授予了这个项目阿迦汗建筑奖。虽然规模小，投资少，但该项目不仅满足了当地社区的重要需求，还保护并弘扬了当地的手工业遗产。

相较于阿卡迪亚教育项目，位于中国的富阳文村改造项目显然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具规模和影响力。富阳文村改造项目由业余建筑工作室负责，是中国乡村改造与振兴的范本。文村是一座位于中国山区的小镇，这里有使用木构架和砖墙的清代老房子，也有贴着陶瓷或玻璃面砖的现代混凝土房。业余建筑工作室在这里建造了14座带院落的民居、一座连桥和几座公共的亭子。受到当地建筑的启发，这些新加建的房屋中，传统的材料和平面以一种现代化的手法表现出来。2018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中，也展示了一些类似的乡村改造案例。这些改造案例不仅涉及住宅，还涵盖了学校、农业设施、小型工业和手工业设施等。虽然文村振兴和双年展的大部分项目属于新建而非改造，但显而易见的是，开展这些项目的最终目的

是保护中国乡村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包括某些材料和技术的使用方式、村镇与周围景观的空间组织关系以及农村的生活方式等。

受上述案例的影响，如今欧洲遗产保护界越来越关注非物质的价值和特征。在未来，不同学科、专业和地区之间的知识和经验共享将继续带来关于建成环境的讨论；人口增长、移民、多元化社会和全球变暖等变化将持续给建筑师、决策者甚至整个社会带来新的挑战。在不同文化和观念的碰撞下，新型的城市和乡村再兴方案必将出现。

注释

- [1] 纵观历史，斯普利特古城一直是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和建筑师的圣地。安德烈亚·帕拉第奥·罗伯特·亚当斯等人曾来此观瞻古罗马城堡遗址……1979年，斯普利特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2] 具体案例可参见十次小组成员阿尔多·罗西、克里尔兄弟，或者简·雅各布、菲利普·布顿等社会学家的作品和著作。有关20世纪城市规划和保护理论的发展概况，可参阅班达林 & 范奥斯(见参考文献[4])。
- [3] 佛兰德斯地区位于比利时北部。在实行联邦州制的比利时，各个地区关于遗产、城市规划和建筑的政策由自己制定。
- [4] PC Cartias 全称为 Psychiatric Center Caritas，改造前是位于比利时梅勒的精神病学中心。

参考文献

- [1] Jokilehto, J.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M]. 4 ed. Oxford: Elsevier, 1999: 354.
- [2] Frampton, K. Modern architecture[M].Tokyo: ADA Edita, 1980.
- [3] Choay, F. L' allégorie du patrimoine[J]. revised edition. La couleur des idées[G].Paris: Seuil, 1992.
- [4] ICOMOS. The Venice Charter. 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R]. Venice: ICOMOS, 1964.
- [5] ICOMOS Australia, Burra Charter, ed. I. Australia, Burra[R]. ICOMOS Australia, 2013.

- [6] ICOMOS. The Declaration of Amsterdam[R]. Paris: ICOMOS, 1975.
- [7] ICOMOS. The Paris Declaration On heritage as a driver for development[R]. Paris: ICOMOS, 2011.
- [8] ICOMOS. The Valletta Principles for the Safeguarding and Management of Historic Cities, Towns and Urban Areas[R]. Paris: ICOMOS, 2011.
- [9] Murphy, R. Carlo Scarpa and Castelvechio Revisited[M]. Edingburgh: Breakfast Mission Publishing, 2017.
- [10] Plevoets, B. and K. Van Cleempoel. Adaptive Reuse of the Built Heritage: Concepts and Cases of an Emerging Discipline[M]. London: Routledge, 2019.
- [11] Machado, R. Old buildings as palimpsest. Towards a theory of remodeling[J].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1976 (11) : 46-49.
- [12] Artalo, I. & K. Rademaekers. & R. Williams. & J. Yearwood, Boosting Building Renovation: What potential and value for Europe? [R]. European Union. Policy Department A: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olicy: Brussels, 2016.
- [13] Koolhaas, R. Preservation is overtaking u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4] Plevoets, B. & M. Berger. & S. Stone, An Interior Approach to Education and Adaptive Reuse[J]. Interior Inferior Theory, Routledge: London. 未出版。另可见会议集 'Interior-Inferior-In Theory? Contemporary Positions in Interior Design Theory', Berlin, 2018.
- [15] Grafe, C. & S. De Caigny. & K.Hannema. Onvoltooid Verleden[M]. Antwerp: Vlaams Architectuur Instituut, 2017.
- [16] ICOMOS. 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 in Relation to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R]. Nara: ICOMOS.
- [17] Smith, L. Uses of Heritag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图片来源

- 图1: 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提供
 图2、图3: 欧洲信息与文化图书馆(BEIC) 提供
 图4: 哈塞尔特大学(Hasselt University) 提供
 图5~图7: Kim Zwartz 拍摄
 图8~图11: Stijn Bollaert 拍摄
 图12~图15: Philip Dujardin 拍摄
 图16~图19: Luuk Kramer 拍摄
 图20: 阿迦汗文化信托基金会(Aga Khan Trust for Culture) 提供